



谈谈我的“五子登科”

○湖北潜江市张金镇财政所党支部书记 金成喜

1990年冬季,有两位同志到我们单位采访,写成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,题目叫《金成喜的“五子”登科》。文章后来在1991年第1期《湖北财税》上发表了。出乎我的意料,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其实,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和财政干部应该做的事。为了叙述的方便,我也只好借用那篇文章的题目,谈一谈关于我的所谓“五子登科”。

第一,正确对待位子。

在我们共产党内,不论职位的高低,都是人民的勤务员。我1958年入党,当过生产队财经队长、大队党支部书记,担任过8年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多年公社党委书记。曾被选为第四届、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,30多次被评为省、地、市(县)先进工作者、劳动模范和优秀党员。1993年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。现在,担任潜江市张金镇财政所专职党支部书记,兼任市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
我今年58岁了,大半生的经历证明,个人的兴衰荣辱,是与党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党喜我喜,国喜我喜。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,能获得如此地位和荣誉,已经足够喜的了。这一切,都是党和国家给的,人民给的,我满足了,并深感受之有愧。因此,当人们认为我按常规可以登上更高的位子时,我却在1984年的那次机构改革中从原来的位子自觉“落”下来了。当时我还不满49岁,在潜江县张金公社任党委书记。按当时有关政策规定,我可以退也可以留。是退还是留?人生的十字路口摆在了我的面前,要我作出选择。我没有犹豫,毅然向县委提出了退下来,让年轻同志挑重担的请求。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几次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在“进县城、留区委、到部门”三者中选择了后者,并明确表示就在张金镇安家。这样,我便当上了张金镇财政所所长。于是,人们把我称之为“一位当过‘县官’的财政所

长”。

我走了一条世人难以理解的路。虽然一再讲干部能上能下,能官能民,但在人们的观念中,是只能上不能下,只能官不能民,除非犯了错误。在潜江,公社党委书记当所长,还没有先例。我认为我的路走对了。在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上,我又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位置。原来我是所长、书记一肩挑,1991年5月又主动从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,只任书记的职务,腾出位子让年轻的同志上。所长的职务卸了,但肩上的担子不能卸。在我们张金镇所,年轻的所长尊重我这个年老的书记,我这个年老的书记尊重年轻的所长,谁也不计较位子,不计较得失,完全以事业为重,以工作为重,位子就是担子,位子有高有低,担子无轻重。能挑一百斤,不挑九十九,这才是党员干部对待位子的正确态度。

第二,带头做出样子。

我当公社党委书记时,就牢记着一句名言:“说破嘴皮子,不如干出好样子!”1984年刚来到张金财政所,同志们关切地对我说:“老书记,您只管动动嘴、掌掌舵,跑腿的事我们去。”我感谢大家的好意,但心里却暗暗地想:当领导的哪有光说不干的道理呢?况且职位的变化,对我来说还有个重新学习的问题。

1985年初冬,全区的公粮水费还剩几个“尾巴”。我连夜开会,分工承包,又将全区最远的双河乡四个村的征收任务揽到了手里。那几天连天雨雪,寒风刺骨。我顾不了气候的恶劣,第二天清晨就披上雨衣上了路。这天,我足足在泥水里奔波了60华里,当天就收齐了欠交的2300多元农业税和水费。由于我带头做出了样子,全所同志在工作中见困难就上,有一股子拼劲和闯劲,年年提前完成了各项任务。1985年以来,张金镇财政所连年被评为全市财贸系统和财政系统的先进单位。1988年被市委、市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。

1991年5月,我从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,专干支部书记的工作。事情是少了一些了,但我并不感到轻松。所里20个职工,大多数是年轻人。一个单位就象一个家庭,书记就象家长一样,不能倚老卖老,只说你们的拐。要替他们干实事、干好事,在各个方面都做出样子。小杨是所里的年轻女职工,玩性大,比较散漫,我曾多次找她谈话,但毛病总难改掉。我就去临近的铁匠沟财政所找她的父亲反映情况,要求配合做工作。有天晚上,小杨的父亲冒雨骑车赶了20多里路,来到我所里参加帮助小杨的专门会议。这次会全所成员都参加了。老杨与小杨面对面交谈,参加会的人都发了言,效果很好。从此,小杨象变了一个人,各方面都表现不错。

第三,用好手中的票子。

财政所长虽然权力不大,但是一方的“财神爷”。考虑到这种职务的特殊性,我就格外警惕自己,要用好手中的权,用好手中的钱。我的亲戚朋友对我的脾气都是了解的,过去我当公社党委书记时,他们没有沾到我的半点光,不过,他们现在也在想,金成喜的官越做越小了,年纪越来越大了,老脾气是不是改了呢?有时他们不免试探性地找上门来。

我的舅弟在一家银行做临时工,行里分配他抓一笔存款的任务,如果完成了,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做临时工。舅弟首先想到了我这个当财政所长的姐夫。一天,他兴冲冲找上门来,要求我把财政的钱划一笔过去。我一听犯了难:划吧,不符合原则;不划吧,舅弟就做不成临时工了。见我眉头紧锁不吭声,老伴在一旁发了话:“你就不能灵活一回?”我说:“灵活?那原则呢?”老伴一听有点生气了:“就你有那么多原则!”我耐着性子向老伴和舅弟解释,他们总算勉强不强不作声了。后来,舅弟带着失望的沮丧神情走了。我想追上去送一程,但站在原地怎么也迈不开步。我在想,我是不是做得过分了呢?我是不是把政策、原则想得太多了呢?但我又一想,我是对的,相信亲人们最终会理解我的。事情果然如我所料,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时,我的老伴也成了我做对方工作的帮手,并且经常重复着一句话:“他哪里有钱啊?有也是国家的!”

作为财政所长,如何用好手中的钱?我的体会是:该“小气”的时候要“小气”,不怕人家说自己“六亲不认”,是“吝啬鬼”;而对政策规定的扶持对象却要“大方”,要慷慨解“囊”。

1989年春节前两天,也就是农历腊月28日。人们正忙着操办年货,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丰收年。而在魏桥村五组一户农家,却是另一番情景。主妇姓董,前几年

死了丈夫,上有70岁的婆婆,下有呆傻的大儿子和只有10岁的小儿子。家中缺劳力,吃饭的多,做事的少,平时的生活都很难,哪有钱来过年呢?了解到这一情况后,这一天我迎着刺骨的寒风,带着50元农业税减免款来到了她的家中。当她接过那5张崭新的“大团结”时,手颤抖了,泪水夺眶而出,嘴里不断地说:“感谢党,感谢政府……”说着说着两腿就往下弯屈。我生怕她真的要跪下来,连忙搀扶住,说:“我们来晚了。快用这些钱到镇上割点肉、买点鱼,热热闹闹过个年。到了明年,把生产搞好。我和村里的干部已经商定,把你家定为重点扶贫户。”她愁苦的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,两个孩子也一齐扑了上来,一口一声“金伯伯”叫个不停。

这一次,我才掂量出票子的真正份量。

第四,心里有把尺子。

对我们每个干部、每个党员,群众眼里都有一把尺子,随时随地在丈量着。但是,更要紧的是要把握住自己心中的那把尺子。要经常地、严格地量量自己,自己的一言一行,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?符不符合人民的利益?

有一次,我在龙湾血防站治疗血吸虫病就要出院了,医生关切地对我说:“住一次血防,对肝脏影响很大,我给你开点肌苷、人参蜂王浆回去补补身体吧!”我婉言谢绝了,带着不到200元的医疗单据回到了单位。1988年夏天,我皮肤过敏,到医院看病,医生给我开了处方的处方,但看到挂一次吊针要10多元,我决定不挂了,把处方带了回来。全身奇痒难忍,我就把塑料瓶剪成三角片在身上刮,好些地方刮得血流。老伴见了心疼,有时只好抢过三角片,替我轻轻地刮。除那次治疗血吸虫病和1993年上半年又一次住院外,我每年的医疗费没有超过20元。有人说我是铁打的硬骨头,看病少,报销的医药费少。其实,年纪大了,免不了有个三灾六病,但能撑我就撑,能顶我就顶。为什么我要这样“抠”自己呢?因为我们理财的人最懂得钱来之不易,对公家的钱也恨不得一分掰成两半用,能节约就尽量节约。

荣誉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,成绩和贡献只能说明过去,虽然做了点工作也是应该的,决不能以此为“资本”来抬高自己,伸手要待遇,要照顾。多年来,我月工资只有89元,只是1990年按政策调了两级。我家庭生活一直过得节俭,个人的穿着也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。人们笑我保持了“贫下中农的本色”,我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夸奖,不是什么坏事。

一位上级领导曾经这样评价过我:“老金是檀香木



○刘弘 马学雷

他已年近半百,先后经手贷放的财政支农周转金100多万元,扶持了乡镇企业和农村渔业、林果业的发展,富了村,富了镇,富了乡亲,可自己依然两袖清风。他就是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官垱镇财政所所长李书银。在老李勤奋耕耘的带动下,官垱镇财政所的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多次被评为市、区财政系统先进单位,他也多次被评为市、区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。所里的干部职工都亲昵地称他是“咱们的红管家”。

“这衣服俺不能穿”

前几年,官垱镇办的服装厂因资金困难,陷入了濒临倒闭的窘境。李书银知道后,通过认真调查研究,给该厂注入了几万元周转金,使服装厂很快恢复了生机。为感谢他,服装厂特意按李书银的身材缝制了一套羽绒服送到他家。老李却对来说:“这衣服俺不能穿!按做,变不了型。”我也相当自信:风风雨雨,波波浪浪,我都经历过,反正我是“船在摆,人不动”。如果我变了型,群众眼中的尺子是最准确的,也是最灵敏的。关键是要把握好自己心里的那把尺子,不要让它变型。

第五,严格要求孩子。

有了个当“官”的老子,孩子也能安排一个好位子,时下这种事情不少。我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时,几个儿女已成人。只要我稍微利用职权,孩子们的工作都能安排好,但我并没有在这上面动过心思。一谈起这,孩子们就要“怪”我了。

老大1974年高中毕业时,正赶上村里有一名推荐上大学的指标。当时,只要我这个当书记的爸爸出面,他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。他为此事找过我,而我则丢给他一句严肃的原则话:“名额有限,干部子女不能去争。”他听了我的话。后来,我支持他报名参了军,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负了伤。5年后,他带着伤情证明复员了,又满以为我会出面给他安排个工作。可我认为他不够条件安置,始终没有出这个面。大儿子当时有想

给你们周转金是镇里对你们厂子的扶持,并不是我个人的恩赐。以后,只要你们守信用,我们财政所会照拨周转金的。”

“这家具俺付钱,红包还给你”

官垱镇财政所修建宿舍楼即将竣工时,包工头见得利不多,便想追加款项。

他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套家具,还带上了500元的“红包”来到老李家,趁老李不在家,谎称是老李买的,骗其妻子收下。老李回来知道后,先批评了妻子,又找到包工头,按价付给了家具款,退还了“红包”,意味深长地说:“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们,我们不能这样见利忘义呀!”包工头只得打消了念头。

“这些鱼肉全充公”

近年来,老李先后想办法筹集调度财力,投入资金10多万元,帮助该镇亚南、高桥等村建起了渔业、林果基地,使当地群众富了起来。老李也被当地人看作是“财神爷”。有一天,一个村办渔场为了感谢老李的帮助,送来了上百斤鱼和猪肉。老李照价付款,对所里的同事们说:“这些鱼肉全充公了。”

法,说我这个做老子的“太无情”了,“僵化”得像块石头。后来,还是我的一些老同事主动帮忙,将他安排在西大院农场做临时工。至今,他还只是个合同制工人。我共有子女6人,除了一个儿子上电大后在镇办工作被招干外,其余的都是一般职工或临时工。当然,令我感到欣慰的是:儿女们的工作都干得不错,没有给我丢脸,他们都能理解我,支持我。

我总认为,干部家属子女不能有半点特殊。要说特殊的话,就是要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。平时,孩子们读书需要笔记本和稿纸,我都要自己掏钱买,从不占用公家一张纸。按所里规定,我享受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,但我从不让老伴和孩子用我的名字开药。老伴和孩子们也很自觉,总是听我的。在住房上,我同其他干部职工一样,也不搞特殊化。1984年我到财政所上班不到两个月,全家就从新盖的公社干部宿舍搬到了所里。当时,所里住房条件差,我全家10口人挤在一间半房子里,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。同志们几次要我调一调,我都婉言谢绝了。

(杨开水 鲍帮协 李国平 整理)